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408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9190·027　定价：2.25元

《郎君行记》碑前面刻契丹小字，后面刻汉字，在汉字部分的最后一行写明“右译前言”，因此可知这块碑所刻契丹、汉两种文字是对译的。《郎君行记》的汉文部分记载了一些人名、地名，而与此相对的契丹字应是音译。契丹小字是拼音文字，只要找出音译汉字的契丹小字，将其分解成原字，再用其它音译词中的同一原字进行印证，就可构拟出一个大致的音值。研究小组还发现，不少契丹字的职官名也是音译汉语的。于是译出了一批契丹小字的职官名称。在这个基础上又解读出一些契丹本民族语言的单词，并发现契丹语有元音和谐律。这样，连同经过检验的前人成果在内，共构拟出一百四十多个原字的音值（约占原字总数的三分之一），解读出三百多条词语和分析了几十种语法成分。

研究小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应看到，所使用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毕竟是少数，而大量的固有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发表研究契丹文字文章的还有胡振华、沈汇、高路加、黄振华、贾敬颜、即实、王晴、苏赫、阎万章等。一个新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注　释

① 见《林西辽陵石刻出土记事》，载《书香》第46期，1933年1月。

② 见《东亚考古学》，平凡社，1939年9月。

③ 朱子方还曾在1946年探讨过“契丹大小字创制的年代问题”，见《东方杂志》42卷12号。

略论《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

于　宝　林

在契丹字研究中，有一种学说，主张依据蒙古语音、比照突厥字母来解读契丹字，我们可将之称为“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说。这个学说至今在日本尚有影响。在我国的契丹文字研究中也有人沿用这个方法。

这个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村山七郎。其代表作是《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以下简称《方法》）。①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对于这篇文章，有人推崇备至，有人提出疑义。日本著名东洋史专家田村实造对该文大加赞扬，他说：“关于契丹文字，有很多学者长年累月致力研究，但迄于今，尚未能发现解读的钥匙，由于村山七郎氏的天才涣发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而解读成功。”② 他又说：“由于村山七郎在日本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言语研究》（十七、十八合刊号）上发表了《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一文，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象这样的成功，不能不说是由于我们的少壮学者努力带来的，是值得我们在全世界夸耀的。”③ 他还把这篇文章喻为“哥伦布使鸡蛋立起来。”④ 但长田夏树、山路广明则提出不同的看法。长田夏树说：“村山氏的研究，最突出的结果是把契丹字与突厥字结合起来加以说明……结果达到了不合理的结论，对这种做法，我不能全部同意。”⑤ 山路广明说：“日本有些学者，立‘契丹小字直接由突厥文字所制作’之说，我认为这是误解。”⑥

鉴于这篇文章是一重要学说的代表作，以及这篇文章在契丹文字研究史中的特殊地位，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仔细研究。下面谈点个人粗浅看法，就教于国内外的契丹字研究者。

一

关于村山七郎的解读方法田村实造概括了一段话，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他说：村山七郎“主要继承了罗福成的成果，也参考了白鸟库吉的意见，建立在假定把契丹语看做蒙古语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他考虑到迭剌所学习的回鹘语言、文字是古代突厥文字，从而把见于被罗福成认定了的道宗和宣懿皇后哀册上的契丹文字同突厥文字比较对证，终于发现了解读契丹文字的关键”。⑦

村山七郎构拟契丹字音值的做法，总括起来是分四个步骤进行的：（甲）利用罗福成解出的契丹字义，（乙）对照蒙古语找出字音，（丙）再到突厥字母中去寻找同音的字形，（丁）最后经过调整，确定契丹原字的音值。

下面，举几个具体字例就可看明白。

〔表一〕

契丹字	(1) (2)
契丹原字	(1) (2) (3) (4) (5)
突厥字母	(1) (2) (3)

例如，上表中契丹字（1）罗福成解为“蛇”意；“蛇”在蒙古语读为 mogayi；突厥字母(1)音 m，(2)音 g^2，契丹原字(1)来源于突厥字母(1)，契丹原字(2)来源于突厥字母(2)，又推出契丹原字(3)音 y^2，得出契丹字(1)音为 g^2my^2；经过调整，其音为 $m°g^ayi$。

再如，契丹字（2），罗福成解为“册”义；“书册”蒙古语为 nom；突厥字母（3）音 n^2，（1）音 m。契丹原字（4）来源于突厥字母(3)，契丹原字(5)来源于突厥字母(1)（竖起来），得出契丹字(2)音为 nm；经过调整其音为 $n°m$，等等。

村山七郎推论出的契丹字音值，总括在他的文章最后所列的表中，田村实造将此表全部转录于《世界历史事典》的“契丹文字”条内。现将这个表转抄如下，为使读者看起来方便，转抄时将该表作了简化和归纳（见下页〔表二〕）。

我认为，这种将契丹字比附突厥字的作法是牵强的，经不住实践的检验。

首先，契丹字和突厥字显然不是一个文字系统。据现有资料统计，契丹小字有三百五十多个原字，而突厥字母才四十个左右；契丹字的书写行款是从上到下成竖行，每个契丹小字由一至七个原字组成，原字排列是从左到右，两原字排列为①②，三原字为①②③，四原字为①②③④五原字为①②③④⑤……。而古代突厥文一般是从右到左横写，与此大不一样；在突厥文中，词与词之间一般用(:)分开（个别文献用丨作分离符号），而契丹字无分词符号，契丹字中的(:)符号，是表示单字的重复，与汉字的用法一样。

再从形体上看，契丹原字笔划繁复（五、六画常见，最多十画），而且方正，拐直弯，突厥字母则有大量的弧形和圆形笔划。从已发现的文献来看，契丹字有楷书、行书、篆书等书体，突厥字则没有。总之，我们只要不带偏见，展眼就能看到，契丹字与突厥字两者是很不相同的，契丹字不可能从突厥字变化而来。如果从字形上来讲，契丹字倒是更接近于汉字。这是因为在制字过程中受到汉字影响的缘故。契丹大字还有直接借用汉字的情况，如：“月”、“日”、“皇帝”、“太王”等。

〔表二〕

推论上的契丹原字音值	契丹原字	所依据的突厥字母	突厥字母音值
ö	𐰾	𐰺	ö, ü
q(k')	𐰀,𐰁,𐰂,𐰃,𐰄,𐰅	𐰴,𐰵,𐰶,𐰷	q(k')
q°	𐰇	𐰑,𐰒,𐰓	q(o,u前后)
γ(g')	𐰉,𐰊,𐰋,𐰌,𐰍	𐰔,𐰕	γ(g')
k²	𐰏,𐰐,𐰑	𐰖,𐰗,𐰘	k(k²)
g²	𐰓,𐰔,𐰕	𐰙,𐰚,𐰛	g(g²)
t'	𐰖,𐰗,𐰘,𐰙,𐰚	𐰜,𐰝,𐰞	t'
t²	𐰛,𐰜	𐰟	t²
d'	𐰝,𐰞	𐰠	d'
d²	𐰟	𐰡,𐰢	d²
b²	𐰠,𐰡,𐰢	𐰣,𐰤	b²
ń	𐰣,𐰤,𐰥	𐰥	ń
n'	𐰦	𐰧	n'
n²	𐰨,𐰩,𐰪,𐰫	𐰬,𐰭	n²
m	𐰮,𐰯	𐰰,𐰱	m
r'	𐰲,𐰳	𐰴,𐰵	r'
r²	𐰴,𐰵	𐰶,𐰷,𐰸,𐰹	r²
l'	𐰺,𐰻	𐰺,𐰻	l'
l²	𐰼	𐰽	l²
s', š	𐰾,𐰿,𐱀	𐰾,𐰿,𐱀	s'

二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村山七郎的具体论述，可以发现有很多的漏洞和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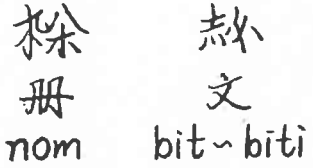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先将《方法》一文所释读的契丹字集中抄录如下。

《道宗哀册》[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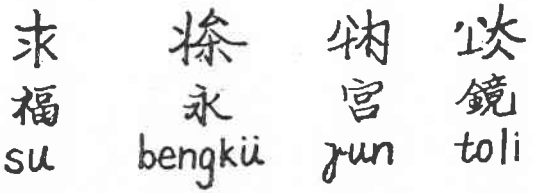


《宣懿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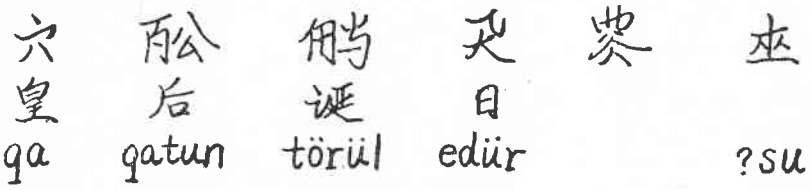




《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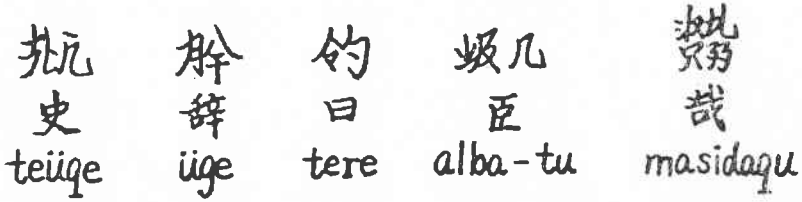
《玉盏》





其它





综观现已发现的契丹字文献，楷书和行书体主要用于志文和一般文章的书写，篆书只见刻于志盖（用以标目）⑧、印章（有的印章旁侧还注有楷书）等，可以说，楷书是通行的正书体，篆书在当时是一种艺术体。因此，我们论证契丹文字字形时不能以篆书为据。村山七郎为了与突厥字比关系，往往用篆书体进行比较，这是不妥当的。

村山七郎是从分析下页〔表三〕中契丹字（1）入手的（这个字罗福成解为"圣"义）。该文是这样叙述的：引起作者最初注意的文字是契丹字(1)，这在道宗、宣懿哀册中写为契丹原字(2)，在比这时代更早的兴宗、仁懿哀册中，写为契丹原字(3)，把这个字推定为古形(而且证明这个推定是正确的)。作者不得不认为契丹原字(3)与突契字母（1）（音d^1）相类似，于是毫不踌躇地把契丹原字（1）决定为d。而且，相当于"圣"的蒙古语是boγda。这样，契丹原字（4)(5)可以暂认为b、γ(9)，这里发生了与突厥字母不合（契丹圆唇元音可以省略），而我们又看到契丹原字（5）

[表三]

契丹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契丹原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突厥字母	(1) (2) (3) (4) (5) (6) (7) (8) (9)

与突厥字母(2)(音b^2)酷似，从而可认为契丹原字（6）是ɣ或g，契丹原字（5）与突厥字母（3）极相似，契丹原字（6）是在突厥字母（3）的旁侧附以装饰的小刀。因此，契丹字（1）是$^{g}_{d}{}^{b}{}^{2}$，转写为$b^{\circ}gd^{a}$。——这就是村山七郎的论证。

契丹语音已失，现保存下来的语言、文字材料极少，解读起来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地参考邻近语言、文字资料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包括突厥字形和蒙古语音在内都可作为

借助对象。但是，在运用时，必须反复验证，结论才靠得住。然而，我们看到《方法》一文往往是在孤证的情况下就下结论，这样的结论自然经不起推敲。拿“圣”字来说，该文单凭契丹原字(3)字形与突厥字母(1)相近就断定其音为d，已很牵强。如果说，这两个字形还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该文为了用蒙古语 boγda 来套，将契丹原字（5）说成与突厥字母（2)(b) 相似、契丹原字(4) 与突厥字母 (3)(g)相似，则更是生拉硬扯。该文可能也看到两者拉不到一起，为了硬将“它们”往一块拉，就用契丹原字 (4)的繁体，即契丹原字(6)为依据，说该字右部与突厥字母(3)相似，左部是“旁附的装饰小刀”。尽管如此，该文所得的结果，还是与蒙古语对不上，于是文章说，该字“被转写为$b^{\circ}gd^{a}$”。究竟为什么要“转写”，按什么规则转写，有什么旁证等等，全未提及。显然，这样的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方法》一文刚论证完这一个字就冒然断论：“从这里看出，契丹字并不遵守元音和谐律，而且也不标出圆唇元音，文字排列方向是从右向左”。

关于契丹字遵不遵守元音和谐律的问题，请参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四期：《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一文，这里不打算多谈。至于契丹小字的原字排列顺序绝不是从右到左，而是先左后右，两两下移，这只要对照一下道宗和宣懿册盖和册文就能说明问题，册盖是将原字分写，册文是合体，尤其是《宣懿哀册》册盖的文字与册文第一行完全一样，从册盖原字分写的前后顺序就可看出在合体字中原字的排列顺序，所谓“从右到左”完全是该文作者的臆断。

值得注意的是，《方法》一文对照蒙古语 gaγanu gatun，说契丹原字（7）是突厥字母（4）（q，k^1）的变形，该文又将契丹原字（8）分解为“火”和“力”，[10]说看到“火”就像突厥字母(5)(6)（ɣ，q^1）等进入眼帘，“力”为突厥字母(7)(ny)。

契丹原字（9）很可能是qa，相当于突厥字母（4）(q、k^1)。见到契丹原字"公",不禁想起突厥字母(8)（t^o）。据此，该文构拟契丹字(2)、(3)的音值是q^ov^ony q^ot^{ou}。在这里作者给原字排列的顺序不是"从右到左"，而是"从左到右",与前面的结论自相矛盾。

《方法》一文提到,契丹字"不标出圆唇元音",然而i、a并非圆唇元音，该文也未指出相应的契丹字来，这都表现出《方法》一文在标注元音上突出的任意性。元音是一种语言的基本要素，契丹语的元音用什么方式表现呢？该文未提，通篇文章分析了二十多个词,构拟了五十二个原字的音值,其中五十一个是辅音，元音只有一个，即：契丹字（4），作者说:据罗福成解释是"国"的意思，契丹原字（10）的右半部与突厥字母（9）(ö～ü)相似，左半部可能是装饰。从契丹字不遵守元音和谐律这点来说，突厥字母(9)也有表现o～u的可能性。这个元音恰恰是圆唇元音。

该文接触了四十多个契丹语音节，在这些音节中，主要元音"a"出现了十二次，"e"九次，"i"六次，"o"五次，"u"五次等，这些元音都是作者任意安排的。下面举几例说明。

契丹原字（4）（该文构拟的音值是g），曾在契丹字（1）、(5)、(6)中出现过。而该文所拟的音都不一样。其中，第一个契丹字中的原字(3)无元音，第二个契丹字中的原字（3）拟为ga，第三个契丹字中的原字(3)拟为ge。为什么不同？作者只字未提。又如，原字(11)（拟音q）在契丹字(7)中音qa，在契丹字（8）中又音qe，诸如此类，该文一概未指出为什么不同。

再看契丹字(9)，该文指出原字(12)音d，原字(13)音r，合起来音edür。还有契丹字(10)、(11)，其中原字(14)音l，原字(5)音b，契丹字（11）音t，合起来音albatu。在这三个契丹字中元音e、ü、a、u从何而来都不得而知。

因而我们说，该文所考证的契丹语音，其中元音几乎都是作者的任意安排。

为了与突厥字拉关系，《方法》一文甚至曲解原词含义。例如:该文为证明契丹字(12)音qatan，写道:"契丹字(12)在道宗哀册第二十九行中也有,又见于'大金皇弟碑文'，该碑第五行有契丹字(12)、(13)，表示'仲冬'的意思，前者相当于'仲'，罗氏认为'仲'与'辽'同音（见《辽陵石刻集录》卷四),这两个字可能是q^at^any ebül，'严冬'（蒙古语的qatan是'严'，ebül是'冬'）"。我们知道，在"大金皇弟碑文"中，契丹字（12）与汉字"仲"对译。"仲冬"一词按汉语的习惯用法是指十一月,而该碑也正是此意,全句是"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很显然，在这里若用"严冬"来解就完全错了。

另外，在"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一句中出现了两个"文"字，即契丹字(14)，现已考证出这是汉语借词⑪，连同这种格式都是从汉文那里学来的。这里的前后两个"文"字，字虽同，意却异，前一"文"字作为谥号，是皇帝或显赫人物死后人们赞谀死者的专用词,它有专门的含意,⑫后一个"文"字才是"文册"、"文章"之意,而《方法》一文在解这两个字时皆用蒙语bičig来套，这也是望文生义，与原意不合。

三

上面分析了村山七郎的论证方法，下面再检验一下他释读的结果。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织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从契丹文中汉语借词入手，经反复论证，构拟了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这种方法虽然有局限性（对一种语言来说，借词毕竟还是少量的，单靠这个方法不大可能将契丹原字全部解读），而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可靠的。⑬现举几例,将两种方法进行对照:

契丹原字	村山七郎		研究小组	
	拘拟音值	证据（所依据的实际字母）	拘拟音值	证据（契丹小字音译汉字举例）
𘤀	ɣ(gˈ)	↗,↘	i	𘤀(仪)，𘤀(懿)，𘤀(懿) 𘤀(西、漆)，𘤀(祭、济) 𘤀(期)，𘤀(妃)，𘤀(密) 𘤀(尉)，𘤀(室)，𘤀(礼) 𘤀(兴)，𘤀(圣)，𘤀(大) 𘤀(大)，𘤀(骑)
𘤁	ɣ(gˈ)	↗,↘	s	𘤁(青)，𘤁(小)，𘤁(宗) 𘤁(漆、西)，𘤁(修、酒) 𘤁(子)，𘤁(祖)，𘤁(将) 𘤁(相、将)，𘤁(前、仙) 𘤁(宣)，𘤁(三)
𘤂	ɣ(gˈ)	↗,↘	t	𘤂(大)，𘤂(殿)，𘤂(点) 𘤂(德、特)
𘤃	qº	↓,⊥,↑	em	𘤃(检)，𘤃(兼)，𘤃(曲) 𘤃(点)

𘤄	K^2	↗,↖,↙	m	𘤄(密)，𘤄(马)，𘤄(全) 𘤄(门)，𘤄(庙)
𘤅	$t^{\prime}$	↗,↕	n	𘤅(宇)，𘤅(内)，𘤅(院) 𘤅(院)，𘤅(观)，𘤅(元) 𘤅(元)
𘤆	b^2	↗,↗	u	𘤆(吾)，𘤆(副)，𘤆(保)， 𘤆(道)，𘤆(武)，𘤆(海) 𘤆(右)，𘤆(洛)，𘤆(力)
𘤇	$\dot{n}$	↗	a	𘤇(马)，𘤇(史)，𘤇(山) 𘤇(兰)，𘤇(三)
𘤈	n^2	↗,↗	$t\int^{\prime}$	𘤈(州)，𘤈(诸)，𘤈(昭) 𘤈(臣)，𘤈(臣)，𘤈(册) 𘤈(巫、邮)，𘤈(高、上)
𘤉	q(K')	↗,↗	$\chi/k^{\prime}$	𘤉(空)，𘤉(期)，𘤉(开) 𘤉(徼)，𘤉(许)，𘤉(客) 𘤉(兴)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来看，我认为村山七郎用突厥字来解契丹字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地看待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契丹字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回顾契丹字的解读工作，大致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此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契丹字是为人们所不识的死文字。包括明、清金石文大家如赵崡、王昶、钱大昕、毕沅等在内，皆将刻于金代天会年间的契丹字《郎君行记》碑误识为女真字。⑭这个误解直到三十年代庆陵哀册出土才被纠正。

1922年6月21日，凯尔（L. ker）在辽庆陵⑮（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东北二十多里）首次发现兴宗及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⑯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将凯尔的抄本与《郎君行记》碑对照，方知后者为契丹字。1930年汤佐荣组织挖掘庆陵，获道宗和宣懿皇后契丹字哀册。契丹字研究工作至此方始。

半个世纪以来，契丹字研究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十至五十年代。以我国学者为主，主要利用契汉对照的方法，解出了一批契丹字的字义。1951年村山七郎《契丹字的解读方法》一文发表，标志着契丹字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阶段主要以日、苏学者为主，特点是寻求契丹字的读音。应该看到，这一工作是相当艰难的，正如当时山路广明所说："直到现在，作为难解的语言（指契丹语——引者注）不用说全文，就是其中一部分读音被尝试出来，都能算是有成绩的。"⑰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各种解读方法，有代表性的除村山七郎的"仿突厥字母说"外，还有山路广明的"仿汉字说"⑱、爱宕松男的"源蒙语说"⑲和长田夏树的"统计法"⑳等。他们从不同角度企图寻找解开这个"二十世纪之谜"的钥匙，其中成败皆有。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前人的成功固然应该赞扬，即便前

人的探求为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也不失其为后来者宝贵的借鉴。科学总是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只要是认真的探索，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即使失败了，从一定意义来讲，对科学的发展也是个贡献。因而，我们说，村山七郎这种在科学上勇于探索、开辟新径的精神是可贵的。事实上，他的《契丹文字的研究方法》一文对契丹文字研究的深入、打开新局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注　释

① 该文载《言语研究》，1951年第17—18合刊号，第47—70页。后面凡引此文均不另加注。

② 田村实造：《从契丹文字的发见到解读》，载《民族学研究》，1951年第16卷第1号。

③ 田村实造所拟"契丹文字"条目，见《世界历史事典》第5册。

④ 见注②

⑤ 长田夏树：《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载《神户外大论丛》1951年第2卷第4号。

⑥ 山路广明：《契丹制字之研究》，1956年，东京亚非研究室刊。

⑦ 同注③。

⑧ 册盖原字篆体分写从略，《宣懿哀册》同。

⑨ 见《道宗哀册》和《宣懿哀册》志盖，而志文为楷书。有的墓志如《故耶律氏铭石》志盖是汉字篆体，志文是契丹字楷书。

⑩ 按原字的组合原则，这是一个原字，不应再分解。

⑪ 见《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

⑫ 见《汲冢周书》卷6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恳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⑬ 见注⑪及《契丹小字解读新探》一文，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⑭ 赵崡《石墨镌华》（明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撰）云："是碑一字不能辨，盖女直字。"王昶《金石萃编》（清嘉庆十年，即1805年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毕沅《关中金石记》（清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撰）皆云："为女真文"。

⑮ 辽圣宗、兴宗、道宗陵。

⑯ 凯尔当时未制拓片，雇人手抄，抄本发表在《北京天主教刊》118号，后伯希和将其转载在《通报》上。

⑰ 见山路广明：《契丹语之研究》第1辑，1951年7月油印本。

⑱ 见注⑥及注⑰。

⑲ 见爱宕松男：《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载《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56年第7号和《契丹文字鱼符、玉盏、铜镜铭文的解读》，载《文化》1956年第20卷第6号。

⑳ 见注⑤。

女真文字研究概况

金启孮

女真文字是中国古文字的一种，创制于十二世纪，在国内部分地区推行、使用达五个世纪之久。

女真文字是金太祖阿骨打天辅三年（1119年）以契丹、汉字为基础，加、减或变化其笔划制成的。

有清一代讳言女真，天聪九年（1635年）清太宗除将国号"金"改为"清"之外，还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从此二百年来研究女真成为禁区，女真文字也不例外。直到清朝中叶文网渐弛，女真文字才为学者所注意。今天中外研究女真文字的学者日多，女真文字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学问。

一、女真文字的源流

任何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当他们创造本民族的文字时，必然受到文化较高的相邻民族文字的影响。他们或者直接采用相邻民族的文字，或者经过某种程度的改造后用作书写本民族语言的符号。中国的契丹，党项二族就是参考汉字的笔划结构，创造了契丹和西夏字的。

与女真有关的契丹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契丹大字造于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现存石刻有1954年在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村出土的《萧孝忠墓志》（简称"萧墓文字"）。契丹小字造于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现存石刻有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庆陵发现的辽代《庆陵哀册》（简称"庆陵文字"）。前者为单体字，